

近代英国工业城市的空间结构与城市规划 (1848—1939)

梁 远¹ 刘金源²

(1. 山东大学威海校区 翻译学院, 山东 威海 264209;

2. 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 要:以曼彻斯特、伯明翰和利兹为代表的新型工业城市在空间结构方面体现出鲜明特征:随着新型工业建筑的出现,土地功能实现区分;各类建筑交叉林立,城市布局混乱;新的社会阶层居所分离形成。这种空间结构特征,使得工业城市中的“城市病”问题尤为突出。在英国19世纪中叶兴起的近代城市规划运动中,工业城市积极开展规划实践,空间结构得到合理重组,“城市病”得以缓解,城市面貌显著改观。

关键词:工业城市;空间结构;城市病;城市规划

中图分类号:K5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5)04-0141-08

The Spatial Structures and Town Planning of Industrial Cities in Modern Britain(1848—1939)

LIANG Yuan¹ LIU Jin-yuan²

(1. Schoo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Shandong University at Weihai, Weihai 264209, China;

2. School of Histor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9, China)

Abstract: As the new type of cities, industrial cities, represented by Manchester, Birmingham and Leeds, embodied unique spatial structures: the land's functional classification was formed with the appearance of new industrial buildings, the architectural layout took on a chaotic look because of the mixture of various kinds of buildings and the new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of different classes emerged as well. These structural features resulted in especially serious “urban diseases” in industrial cities. During the modern town planning movement since the mid-19th century, industrial cities actively carried out planning practices. As the achievement of town planning, the spatial structures of industrial cities have been reasonably re-organized, “urban diseases” have been relieved and cities' appearance has been remarkably improved as well.

Key words: industrial cities; spatial structures; urban diseases; town planning

作为工业革命的诞生地,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城市化的国家。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开始后,一种以工业生产为中心的新型城市迅速兴起。与中世纪城市相比,曼

彻斯特、伯明翰和利兹作为近代工业城市的代表,逐渐呈现出崭新的空间结构特征,并出现尤为严重的“城市病”。学术界对英国城市化及城市问题虽有一定探究,

但鲜有著述专门论及工业城市的空间结构及其产生的城市问题^①。基于此,本文将以曼彻斯特、伯明翰和利兹为例,对近代英国工业城市的空间结构及其导致的城市问题加以阐述,并分析工业城市以城市规划为手段、重塑空间结构的实践,以从根本上深化学界对英国城市化进程的认识。

一、工业城市的空间结构

城市史学家亚瑟·加里昂认为,城市的发展不仅仅意味着建筑物的增加以及居民的聚集,而是城市内部产生了各具功能的区域,如工业区、商业区和居住区等,各功能区的地理位置及其分布特征的组合关系就是城市的空间结构^②。城市发展方式的特殊性与其提供的经济服务类型紧密相关,近代英国工业城市以工业生产为主要的经济职能,因而形成了崭新的空间结构特征。

首先,近代工业城市最突出的空间结构特征就是新型工业生产性建筑大量涌现,使得市民的生活和工作场所得以分离,从而促进了城市土地功能的区分。

中世纪的英国城市,或称前工业城市,大多是作为政治、宗教及经济中心而建立^③。城市中分布的主要是各种非生产性建筑,如市政厅、行会会馆等市政建筑,以及各类各式的宗教建筑。城镇中的生产组织形式主要是家庭作坊制,典型的作坊前面为制造和出售产品的店铺,后面或楼上则是家庭成员以及佣工共同居住的地方^④。在家庭住所和工作场所合而为一的情况下,这种家庭作坊主要还是属于居住建筑。因而,中世纪城市中不存在单独的工业建筑和商业建筑,也就没有土地功能上的工业区、商业区和居住区的划分。

近代工业城市以工业生产为主要经济职能,工业建筑的大量涌现成为其最鲜明的城市景观。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使得工厂主摆脱对水力的依赖,在兴建厂房时能够且倾向于将厂址选在城市中心地区,以获取充足的劳动力、原料供应和便利的销售渠道。以棉纺工业中心曼彻斯特为例,18世纪80年代,第一家蒸汽动力的棉纺厂在此建立,1794年时仅为3家,到1853年时则达到108家^⑤。此外,1815年时市中心区已建有1819间仓库,当年整个曼彻斯特地区更是兴建了多达1450间仓库,此时的曼彻斯特甚至被称作“仓库城”^⑥。

在工厂和仓库等工业建筑中,资本和劳动力实现了集中,这些工业建筑所在地构成了单独的工业用地。对于工作在其间的大量工人和工厂主而言,他们必需另在他处构建居住场所,居住与工作地点发生了分离,尽管两者间往往相距很近。在工厂制带来家庭生产功能衰落的同时,家庭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家庭被视作纯粹的私人生活空间。因而18世纪以来,城市中新建的住房开始单

纯以居住为目的,内部结构也发生相应变化:一层是不直接连通街道的客厅;二层的卧室变得越加注重隐私,通常带有盥洗室;厨房则建在地下室^⑦。这样一来,不仅城市中家庭的生产活动在工业建筑内实现,其商业活动也被转移到单独的商业建筑中,商业用地和居住用地随之得以区分。1850年时,约瑟夫·阿谢德绘制了24幅曼彻斯特分区地图,他用不同的标识和颜色,区分出城市中公共建筑、工业建筑、商业建筑和居住建筑的所在位置^⑧。由是观之,当时工业城市中土地的功能分区已经相当鲜明。

其次,为满足经济发展和市民生活需要,数目庞大的各类建筑密集交织,并由于缺乏规划而形成极不合理的布局结构,这是工业城市空间结构的另一特征。

①国外学术界对工业城市的研究,主要有:理查德·丹尼斯的《19世纪英国工业城市:社会地理学》(Richard Dennis, *English Industrial Citie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Social Geogra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其主要从社会地理学的角度描述了工业城市的交通、住房、人口等的分布情况;西门·冈的《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的公共文化》(Simon Gun, *The Public Culture of the Victorian Middle Clas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0),书中以曼彻斯特、伯明翰和利兹作为案例,描述了19世纪中叶后这3座工业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如何通过重塑城市面貌以反映本阶级的文化特征,这可以看作是工业城市改善运动的一个方面。国内的研究以关注近代英国城市问题的论文为主,如刘金源的《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环境问题及其成因》,《史学月刊》2006年第10期;梅雪芹的《19世纪英国城市的环境问题初探》,《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陆伟芳的《19世纪英国工业城市环境改造》,《扬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②Arthur Gallion, *The Urban Pattern: City Planning and Design*,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Company, 1983, pp. 14—16.

③(英)彼得·拉克、保罗·斯莱克著,薛国中译:《过渡时期的英国城市:1500—1700》,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

④徐浩:《浅析西欧中世纪工业组织的变化》,《世界历史》2005年第4期。

⑤⑦Peter Clark ed., *The Cambridge Urban History of Britain: 1540—1840*, Vol.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810; pp. 617—618.

⑥John Bailey, *Manchester: An Architectural Histor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9.

⑧Joseph Adshead, “24 Illustrated Maps of the Township of Manchester: Divided into Municipal Wards”, <http://enriqueta.man.ac.uk>.

中世纪的英国城市除伦敦外,人口都不超过5万人,且增长速度缓慢,城市空间结构变化不大^①。在经济方面,城市中仅有一些传统手工业和商业贸易,城市功能比较原始,布局也十分紧凑,设计和规划也较为合理^②。

到了近代,英国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城市化浪潮,城市的数量和规模急剧增长。工业城市由于具有物质条件优越、就业机会众多等吸引力,其人口聚集尤为庞大且迅速。工业城市的巨大人口在城市空间结构上的反映,就是城市各类建筑的庞大数量。鉴于靠近工业区和商业区修建住宅的便利性,各类建筑呈现出密集交织的状态。在曼彻斯特,每家雇工在500至1000人的大工厂之间,都坐落着工人阶级极其简陋的住宅,成排或成堆地聚在一起。市民的住房也混杂着众多小规模布料切割厂、纺锤制造厂、染坊和印花厂^③。伯明翰市区半平方英里范围内遍布各类手工作坊和住宅,建筑密度和混乱程度可想而知^④。

工业城市中的各类建筑不仅密集交织,而且形成极不合理的布局结构。工厂主或租或买,在自认为最有利于其经济活动的土地上任意建造厂房和仓库,居住和商业建筑的选址也同样是开发商自由选择的结果。此外,修建厂房或民居的多是小型建筑公司,其所承担的项目规模极为有限。如1746—1780年间,在伯明翰只负责修建一两幢房屋的施工项目就占到了所有项目的46%^⑤。在这种情况下,建筑商或开发商根本无法考虑大规模建筑的协调统一,当然更谈不上对各类建筑进行合理的格局安排或综合规划。在利兹,很多小开发商将房子故意设计得后墙上没有窗户,以期将来能获得邻处的土地,建成背靠背街区;三角形的房屋很别扭地被塞进地产的边角处^⑥。而在伯明翰,开发商往往在已有建筑的空隙中塞入众多小面积住宅区。这些住宅建筑成本低廉,没有任何秩序可言,居民大多为工人阶级^⑦。

最后,工业城市中开始出现新的社会阶层居所分离现象,即工业区、商业区和下层居民集中在拥挤混乱的城市中心区,而中上阶层逐渐迁至远离市区的郊区居住,这成为工业城市空间结构的第三种特征。

社会阶层居所分离是指不同社会阶层的市民往往固定居住在城市的不同位置,这种现象是一种重要的城市特征,但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在英国中世纪城市中,社会阶层居所分离现象在城市空间结构中表现为同心圆式的三重结构:贵族居住在市中心,商人和手工业者等一般市民居住在市中心周围,最底层的阶层如奴隶、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居住在城市最边缘^⑧。

在近代工业城市中,起初所有的工厂主和工人都工作和居住在城市中心,但由于人口的不断注入和建筑的混乱密集,市中心区逐渐变得拥挤脏乱,兼之污染严重,

令人无法容忍。对市中心的这种排斥构成了市民向外搬迁的最大动力,也使得城市建设向更广的范围扩展成为必须。同时随着工业城市部分居民经济水平的提高和交通工具的发展,使得迁往郊外居住成为可能。于是,新的社会阶层居所分离现象开始出现。

19世纪之前,只有能够自己负担交通工具的极少数人才得以在市外居住。随着交通条件、尤其是公共交通的发展,更多工业城市的中上层居民得以迁往郊区。被誉为“巴士之父”的乔治·希利比尔于1829年将公共马车引入英国,在城市和郊区间进行通勤变得更加方便^⑨。在伯明翰著名的优美郊区艾吉巴斯顿,人口从1801年的1000人迅速增长至1841年的16500人,这些人大多是富裕的工厂主,如吉百利糖果公司的创始人约翰·吉百利^⑩。在利兹,位于市区西北2英里处的海丁利从1871年开通马拉有轨客车,中产阶层开始大量搬迁至此^⑪。

①Rosemary Sweet, *The English Town 1680—1840: Government, Society and Culture*, London: Longman, 1999, p. 3.

②胡细银:《英国城市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及对深圳的借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③Peter Clark ed., *The Cambridge Urban History of Britain: 1540—1840*, Vol.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811.

④Johann Kohl, *Ireland, Scotland and England*,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1844, p. 8.

⑤Christopher Chalklin, *The Provincial Towns of Georgian England: A Study of the Building Process 1740—1820*,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4, p. 177.

⑥David Ward, “Living in Victorian Towns”, in Alan Baker and John Harley, eds., *Man Made the Land*, Newton Abbot: David & Charles, 1973, pp. 193—205.

⑦Gordon Cherry, *Cities and Plans: The Shaping of Urban Britain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London: Edward Arnold, 1988, p. 17.

⑧周国艳、于立:《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概论》,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

⑨Richard Dennis, *English Industrial Citie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Social Geogra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17.

⑩Leonore Davidoff, Catherine Hall, *Family Fortunes: Men and Women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1780—185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p. 57; p. 369.

⑪Gordon Dickinson, “The Development of Suburban Road Passenger Transport in Leeds, 1840—1918”, *Journal of Transport History*, Vol. 4, No. 2 (June, 1960), pp. 214—223.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工人阶层和城市贫民却无力购买郊外住所和负担往返交通费用,只能被迫居住在工商业建筑密布的市中心。以曼彻斯特为例,其市中心有一个长宽各为半英里的商业区,城区的其他部分以及索尔福、休尔姆、阿德威克等地形成了一个纯粹的工人区,像一条平均一英里半宽的带子把商业区围绕起来^①。工人区之外是乡村地区,商人和工厂主居住的独栋别墅坐落在乡间的花园和公园中^②。况且,就工作性质而言,工人阶层的受雇佣性带有很大的随机性,他们必须随时待命,否则就会失去许多就业机会。同时他们所居住的地区还必须能为家中的女性提供补充性就业,以弥补家庭收入的不足^③。这样一来,工人阶级更是只能住在愈加拥挤脏乱的城市中心。

综合而言,英国工业城市作为近代文明的象征,其空间结构率先呈现出与中世纪城市截然不同的特征,这是工业化高潮背景下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由此给工业城市的未来发展带来深远影响:工业建筑是城市繁荣的标志,也是城市经济发展的物质保障;生产、商业和居住场所分离提高了市民的生活质量;部分居民向郊区搬迁成为缓解城市压力、改善居民生活条件的一条有效途径。但另一方面,工业城市的空间结构也构成多种“城市病”的直接诱因。

二、空间结构所导致的“城市病”

“城市病”是近代城市在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和民生问题,突出表现为住房、环境、疾病和犯罪等问题。从根源来看,这些问题是“工业化转型速度过快与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之间的深层矛盾所引发^④。但通过分析不难发现,这些“城市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工业城市的空间结构所造成的。

其一,工业城市中生产的集中以及工业建筑的大量涌现会带来水体和空气污染,从而引发疾病。工业城市周边的河流既为机器运转提供动力,又成为市内工厂排放污水的极佳场所,因而大都受到了严重的工业污染。例如,曼彻斯特 1787—1794 年地图显示,许多水力工厂在梅德洛克河、厄克河和厄威尔河沿岸建造,它们既从河流中汲取工艺用水,也将工业废弃物排入水中^⑤。这些河流恰是曼彻斯特市民的主要饮用水来源。而利兹市民的饮用水主要来自艾尔河,它“像一切流经工业城市的河流一样,流入城市的时候是清澈见底的,而在城市另一端流出的时候却又黑又臭,被各色各样的脏东西弄得污浊不堪了”^⑥。受到污染的饮用水是诱发热病、伤寒和霍乱等传染病的主要因素,极大威胁了工业城市居民的健康^⑦。

在空气污染方面,煤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动力原料

后,由于技术原因导致的不充分燃烧和废气处理装置的缺乏,使得煤炭在燃烧过程中往往产生大量烟尘和二氧化硫、一氧化碳等有毒气体,这些气体排放到空气中后就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⑧。工业生产所用到的化学药品也会造成空气污染。围绕利兹的河水岸边布满染坊,有毒的蒸汽散布出来,诗人约翰·戴尔在 1757 年将其讥称为“感恩的香气”^⑨。空气污染使得市民易感染呼吸系统疾病,构成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

其二,工业城市中各类建筑密集交织、布局混乱会引发居住环境恶劣、公共设施不足、市民生活不便以及公共空间缺乏等众多问题。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这样描写曼彻斯特的土地占有者:“只要哪里还空得下一个角落,他们就在那里盖起房子;哪里还有一个多余的出口,他们就在那里盖起房子来把它堵住。”^⑩这样见缝插针建成的房屋不仅结构混乱,而且其采光和通风的不足还会带来恶劣的卫生条件。在利兹,一些工厂主在工厂附近的有限面积内塞入了小规模工人住宅区,包括臭名昭著的背靠背住房。这种住房只有一面墙上有窗户,采光和通风都极差;房屋围合成狭小的中庭和独头的死巷,只在一角设有公共清洗场所和厕所,几乎没有排水排污及供水设施,因为工厂主认为“将管道引入尽头封死的道路,从经济上考虑是很不划算的。”^⑪此外,由于缺乏规划,居住区毗邻商业区而导致居民生活环境嘈杂的现象也不时出现,市民的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

①⑥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326—327、320、335—336 页。

②Leon Faucher, *Manchester in 1844: Its Present Condition and Future Prospects*, London: Frank Cass Publishers, 1969, p. 17.

③William Ashworth, *The Genesis of Modern British Town Planning*,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54, p. 20.

④许志强:《应对“城市病”:英国工业化时期的经历与启示》,《兰州学刊》2011 年第 9 期。

⑤⑨Peter Clark, ed., *The Cambridge Urban History of Britain: 1540—1840*, Vol.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810.

⑦Bill Luckin, *Pollution and Control: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am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ristol: A. Hilger, 1986, p. 82.

⑧刘金源:《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环境问题及其成因》,《史学月刊》2006 年第 10 期。

⑪David Ward, “The Pre-Urban Cadaster and the Urban Pattern of Leed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52, No. 2 (June, 1962), pp. 150—166.

此外,由于工业城市中各类建筑密集交织,大量厂房、住宅和街道逐渐侵占了原本集体使用的公地,市民们几乎没有可供散步、进行体育及娱乐活动的公共空间。曼彻斯特的工人“很少甚至从来没有在户外做过有益健康的运动,他们的健康水平当然由于缺乏这方面的活动而大为下降”^①。伯明翰的机械工人没有固定的娱乐场所,他们的许多坏习惯(如流连于酒馆和赌场)由此而来^②。因而,工业城市内公共空间的缺乏既会使城市居民因缺少锻炼而影响身体健康,也会使市民精神生活空虚、转而沉迷于酗酒和赌博,从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其三,受经济条件所限,工业城市社会阶层居所分离带来的有能力迁入郊区的只是部分中上层居民,城市中心区仍然聚集了大量下层市民,他们的生活条件并无多大改善。一位作家观察到,许多中上阶层搬到郊区后,他们在城市中的空闲房子,多被改建成商店,或者被分隔后进行转租,每栋房子容纳的家庭数甚至相当于之前容纳的人口数,连曾经的花园中也盖满了房子^③。而作为城市的主要管理者和纳税人,中上阶层在自己居住的环境得到提高之余,反而对于城市中心区的改善非常淡漠,甚至反对将政府公共开支用于提高卫生水平、改善住房条件的活动,这在客观上加剧了城市中心区的恶化。市中心的贫民窟成为瘟疫和犯罪的主要集聚地,但疾病流行和犯罪猖獗的受害者却是所有市民。

工业城市中的“城市病”有多种表现形式,大多与工业城市特有的空间结构有关。如果工业建筑的数量和位置得以控制、相邻功能区彼此协调、公共空间得到保障、城市贫民的生活环境获得足够重视,换言之,如果城市的空间结构得到合理调整,“城市病”是可以得到有效医治的。与此相对,工业城市大多起源于自然资源优越、交通条件便捷的乡村地区或小型集市,因而城市中缺乏中世纪城市遗留下来的古老机构和制度的制约。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促进了工业城市经济活动的快速发展,却也限制了政府对社会事务的干预能力。因此在城市建设方面,工业城市的市政当局既无力对建筑的选址进行干预,亦无法对建筑的施工进行规范和监督。换言之,加强市政机构的治理权限,是工业城市空间结构重塑的必要条件。

三、空间结构重组与“城市病”的缓解

通过合理规划,避免或解决“城市病”问题的思想在英国早已有之^④,但真正付诸实践则要等到19世纪中叶以后。“城市病”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合理的空间结构所致,而城市规划作为各级政府有意识管理与干预城市开发过程的活动,其在较小范围内即体现为对城市建筑(群)的空间安排^⑤。为医治“城市病”,近代英国以城市

规划为手段,对城市空间结构进行了调整和重组。工业城市在近代最先呈现出 unreasonable 的空间结构,其城市问题在严重程度上位居各类城市之首,由此成为城市规划运动的先锋。

城市规划要求行政机构对城市建设进行有效干预,但近代英国盛行的自由放任政策和地方自治传统使得各级政府回避干预社会事务,而中央政府则回避干预地方事务。英国于1831—1832年间经历了史上最大规模的霍乱疫情,社会各界普遍意识到城市物质环境的恶化与疾病之间的关系以及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层面)在社会事务管理方面的缺陷。英国遂于1848年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公共卫生法案》,其标志着近代城市规划的兴起^⑥。自此,中央政府通过立法加强了地方政府的治理职能,对后者履行职能的情况进行监督并在必要时予以强制执行,地方政府则在相关法案授权和中央财政支持下积极开展规划实践。

工业城市对空间结构进行调整的规划活动大体可分为3个阶段:

1848—1875年间是以公共卫生为中心的城市规划阶段。中央政府出于疾病防治的目的,颁布了一系列卫生法案,授权地方政府为改善城市卫生状况,对已有街道和建筑物进行改善,并为城市居民开辟适合户外社交娱乐的场所。从1866年《清洁法案》开始,卫生法案强制要求地方政府保障街道和住房的卫生条件^⑦,但由于工业城市采取了积极行动,中央政府无须对其采取强制措施。

在街道治理方面,伯明翰市议会多条街道进行了维修和拓宽:1857年,市议会花费5万英镑进行了17项街道改善工程;1871年起,市内道路的铺设用坚固耐用的

①②(英)罗伊斯顿·派克著、蔡师雄等译:《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人文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7、329页。

③George Robinson, “On Town Dwellings for Working Classes”, *Transactions of the Manchester Statistical Society*, 1871—1872, Manchester: Manchester Statistical Society, 1872, p. 68.

④具体可参见梁远:《近代早期英国城市“乌托邦”思想的演进》,《英国研究》第5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5—205页。

⑤吴志强、李德华:《城市规划原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年版,第63—64页。

⑥苏腾、曹珊:《英国城乡规划法的历史演变》,《北京规划建设》2008年第2期。

⑦Sanitary Act, 1866, s. 49. W. H. Michael, *The Sanitary Acts*, London: H. Sweet, 1867, p. 95.

柏油和花岗岩代替了之前的鹅卵石^①。在城市建筑方面,出于疾病防治的考虑,工业城市政府的治理对象以不卫生住房为主。曼彻斯特市议会从 1868 年开始委派卫生调查员对市内住房的质量和卫生状况进行调查。如果住房确实存在问题,卫生委员会即可出具查封令,并附上一份房屋改造方案。若房主对房屋进行改造,查封令将被撤销。对于房主不愿改造的房屋,市议会将予以强制改造,费用由房主承担^②。1866 年,利兹市议会也通过一部条例,规定每一街区中不得建造多于 8 幢背靠背住房(前后各 4 幢),并且每个街区之间要有室外厕所^③。

在公共空间的开辟方面,曼彻斯特市议会拨款购买了 3 块地产,分别建成女王公园、菲利普公园和皮尔公园,于 1846 年对公众开放。1864 年,英国决定以优惠的利率贷款给地方政府,用以建造公共设施。曼彻斯特利用这一机遇,于 1868 年贷款购地建成了亚历山大公园及阿德威克绿地公园^④。在伯明翰,市议会也从私人地产主手中购置土地,建成卡霍普公园、阿斯顿公园以及阿德利公园。仅卡霍普公园在 1857—1858 年间就接待了近 100 万名游客^⑤。

通过对已建成街道和住房的治理,工业城市内很多环境恶劣、挤满不卫生住房的小巷和死胡同逐渐转变成宽敞、彼此通联的道路网络,住房质量也得到提高,市民的居住环境得到初步改善。新开辟建成的公园大多位于工厂和居民区附近,其中遍布树木花草,起到了净化城市空气的作用。公园中有供市民娱乐使用的各种器械和场所,市民的生活质量和身体素质都得到明显改善,犯罪行为和社会动荡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1875—1909 年间是以住房问题为中心的城市规划阶段。从 1875 年《技工和劳工住房改善法案》的颁布开始,英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住房法案,其授权地方政府清理贫民窟地区以及其他结构不当的建筑群。地方政府或施工单位在清理地区进行重建前,须制定详尽的“改善方案”,不仅方案内新建筑(主要为住房)的自身质量要满足特定标准,而且建筑群要合理布局,地方政府部负责对此进行审查和监督^⑥。从 1890 年《工人阶级住房法案》开始,地方政府对不卫生住房(群)进行治理成为法定义务,若其未能履行职责,地方政府部可接管此类住房或地产,或强制地方当局进行治理^⑦。工业城市往往无须中央干预,反而积极制定改善方案,主动利用中央政府的优惠财政政策。

曼彻斯特市议会于 1890 年向地方政府部提交了“曼彻斯特劳工住宅法案”,计划对市中心约 5 英亩的贫民窟进行清理,地方政府部以临时条例的形式予以批准^⑧。市议会在清理好的原址新建了 2 排 5 层楼高的大型公寓,其呈四方形围合,中间是一个空场,铺满柏油,用于孩子们玩耍。与其所取代的贫民窟住房相比,这些公寓质

量良好、租金低廉^⑨。在约瑟夫·张伯伦任市长期间,伯明翰(1873—1876)开展了“伟大改善工程”,贫民窟清理和重建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市议会于 1875 年提交了清理 93 英亩贫民窟地区的“伯明翰改善方案”,得到地方政府部批准^⑩。市议会清理地产之后新建了宽阔壮观的市政街和一批商业建筑。这一工程不仅极大改善了市区的景观和交通,而且其附近区域的死亡率从动工前 3 年的平均 53.2‰降到了工程实施后 3 年的平均 21.3‰^⑪。据统计,伯明翰在 1869—1884 年间,市政债务从 58.8 万镑增长到 74 万镑,大部分资金都投到城市改善工程中^⑫。利兹市在清理了市中心的贫民窟地区后,在原址新建了城市广场以及令人瞩目的市政建筑,包括中央图书馆、美术馆、教育局大楼等。这些景观不仅改善了利兹的市容,而且彰显了市议会的威严和市民的权力^⑬。

①⑤Conrad Gill, Asa Briggs, *History of Birmingham*, Vol. 1, Birmingham: Birmingham City Council, 1952, p. 426; pp. 422—433.

②④Shena Simon, *A Century of City Government, Manchester 1838—1938*, London: G. Allen & Unwin, 1938, pp. 288—292; p. 305.

③John Burnet, *A Social History Of Housing 1815—1985*, London: David & Charles Ltd., 1986, p. 173.

⑥Robert Higgins,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own Planning in England, 1875—1907*, The University of Alberta, M. A. Thesis, 1980, pp. 59—60.

⑦Housing of the Working Classes Act, 1890, ss. 16, 31. <http://www.irishstatutebook.ie/1890/en/act/pub/0070/print.html>.

⑧Local Government Board's Provisional Orders Confirmation (Artizans and Laborers Dwellings) Act, 1890. *House of Commons Sessional Papers*, Vol. VI. 295, No. 288.

⑨Ernest Simon, John Inman, *The Rebuilding of Manchester*, London: Longmans, 1935, p. 21.

⑩Local Government Board's Provisional Orders Confirmation (Artizans and Laborers Dwellings) Act, 1876, *House of Commons Sessional Papers*, Vol. IV. 43, 63, 295, No. 260, No. 287.

⑪William Ashworth, *The Genesis of Modern British Town Planning*,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54, pp. 97—98.

⑫[英]克拉潘著、姚曾虞译:《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536 页。

⑬Simon Gun, *The Public Culture of The Victorian Middle Class: Ritual and Authority and the English Industrial City 1840—1914*,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51.

通过对贫民窟进行清理和重建,工业城市的市容得到明显改观:新建的住宅区井然有序,改善方案内的商业区与公共建筑群也布局合理、焕然一新。但另一方面,改善方案涉及的面积一般不超过 100 英亩,其无法确保改善区域内的建筑与相邻区域的建筑在功能上彼此协调,从而给市民生活带来不利影响。此外,小规模改善方案往往随机散布在城市各处,地产清理后新建的居住区很可能紧挨工业区,居民难免受到工业废气污染或噪音的困扰。因此,城市中各功能区的合理布局问题仍未得到妥善解决。

1909—1939 年间是以综合治理为中心的城市规划阶段。英国于 1909 年颁布了《住房与城市规划诸法》,“城市规划”第一次作为法律术语出现。这部法案授权地方机构以“规划方案”的形式,为辖区内所有土地按功能划分不同区域,从宏观角度考虑相邻建筑在功能和结构上的协调性。地方政府授权地方当局准备方案,并对方案予以批准和实施监督^①。从 1909 年《住房与城市规划诸法》颁布之后,地方政府有义务为辖区内的所有土地准备并实施规划方案,否则将由中央政府相关部门强制实施^②。但工业城市在城市(乡)规划法案的授权下,积极并创新地实现了城市空间结构的重组。

伯明翰市议会在 1909—1939 年间共准备了 9 项规划方案,4 项方案获准实施,5 项方案处于准备阶段^③。以占地 1443 英亩的“东伯明翰方案”为例,规划区内沿东西方向贯穿了 4 条铁路,因此 3 座工厂所在的工业区被安置在西北、中部和西南临近铁路和运河的区域;大型公园位于价格相对便宜的地段,小型游乐场设在公园附近、居住区和工业区内部;规划区与市区之间、规划区内的工业区与其他区域之间以绿带相隔,其既可以将工业区产生的噪音与烟尘隔离在生活区之外,又可以为工人提供新鲜空气和休闲场所。这一方案充分考虑了东伯明翰地区的整体特征及区内各地块的特征,做到了物尽其用,东伯明翰由此被开发成环境优雅、布局合理、以工业为主的综合性城区^④。可见,通过规划方案的制定和实施,工业城市得以对大范围内的土地(伯明翰 9 项规划方案最少为 1443 英亩,最长达 8267 英亩)按功能进行了合理分区,市区的空间结构重组基本实现。

工业城市不仅通过规划方案对市区进行了综合规划,而且规划的范围逐渐向郊区甚至周边的乡村地区扩展。工业城市郊区逐渐成为中上阶层的住所,这一情况从 19 世纪中叶开始在英国甚至欧美各城市普遍出现。对郊区和乡村进行合理规划将避免“城市病”重现,这在实践中体现为近代英国田园城市和田园郊区的建设,如田园城市莱奇沃斯、韦林、以及伦敦附近的汉普斯特德田园郊区。但这些开发建设大都是民间的活动家或非营利

组织发起的社会改良运动,并不是来自政府的行动^⑤。

以曼彻斯特为例,市议会于 1927 年开始在其郊区兴建了英国第一座卫星城市维森沙维,从而开创了城市规划的新篇章。维森沙维占地约 5500 英亩,其中 2000 英亩的土地用于游乐场所和露天空地;两处工业区被建在横贯地产中部的柴郡铁路沿线,另一处工业区建在地产的最南端;地产上预计建造 2.5 万幢住房,可容纳 8 万名居民,居住区与工业区之间均有绿地环绕^⑥。曼彻斯特市议会作为负责卫星城市开发的地方政府,凭借自身雄厚的财力和物力资源,保证了规划方案的有效实施。截至 20 世纪 30 年代末,维森沙维的居民已达到 4 万人^⑦。而同比之下,1903 年兴建的莱奇沃斯直到 1938 年只有 1.5 万居民^⑧。与单纯以居住为目的的中产阶级郊区相比,维森沙维既缓解了曼彻斯特的住房紧张,又分担了后者的部分经济职能,使其总体建筑密度降低、尤其是工业建筑得以转移和分散,整个城市的空间重组变得更加合理。针对这一规划实践,中央政府也通过立法给予了充分的鼓励和支持。1925 年《城市规划法案》授权地方政府为了兴建田园/卫星城市而强制购买土地,并可以为此从公共工程贷款委员会贷款^⑨。1932 年《城乡规划法案》甚至授权卫生部长强制地方当局为田园/卫星城市制定规划方案^⑩。这说明卫星城市已成为城市规划实践

①Housing and Town Planning Act, 1909, ss. 54—62. W. Addington Willis, *Housing and Town Planning in Great Britain*, London: Butterworth & Co., 1910, pp. 166—172.

②Housing and Town Planning Act, 1919, ss. 43, 46.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1919/35/contents/enacted>.

③James Macmorran, *Municipal Public Works and Planning in Birmingham: 1852—1972*, Birmingham: Public Works Committee of Birmingham, 1973, p. 91.

④The East Birmingham Scheme. George Cadbury, *Town Planning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Birmingham Schemes*,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15, pp. 153—182.

⑤[日]佐藤健正著、王笑梦译:《英国住宅建设——历程与模式》,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67 页。

⑥Ernest Simon, John Inman, *The Rebuilding of Manchester*, London: Longmans, 1935, pp. 43—44.

⑦Rowland Nicholas, *City of Manchester Plan 1945*, London: Jarrold & Sons, Ltd., 1945, pp. 145—150.

⑧孙群郎:《欧美城市规划理论与方法对美国郊区发展的影响》,《求是学刊》2013 年第 1 期。

⑨Town Planning Act, 1925, s. 16. *20th Century House of Commons Sessional Papers*, Vol. IV. 721, No. 228.

⑩Town Planning Act, 1932, s. 36.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1932/48/contents/enacted>.

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病”。

经过综合治理阶段的城市规划,工业城市的空间结构基本实现了重塑:市内街道和建筑卫生良好、布局合理,土地按功能得到合理分区;市郊和卫星城市经过良好规划,容纳了各阶层市民以及部分工业。而随着城市空间结构的改变,工业城市近代早期存在的种种“城市病”逐渐得到医治,城市面貌和市民的工作、生活条件都得到显著改善。

综合而言,在近代英国工业化进程中,工业城市所特有的空间结构导致了“城市病”的产生,而自由放任大背景下市政当局的无为而治成为“城市病”蔓延的重要原因。进入 19 世纪中叶后,以治理“城市病”为主要目标的城市规划运动开始兴起,并历经了公共卫生阶段、住房规划阶段、综合规划阶段。截至 1939 年二战爆发前,通过调整和重组城市空间结构,“城市病”已得到缓解,工

业城市的物质环境大为改善,由此推动着城市化进程进入到一个全新阶段。英国在城市化方面的经验教训,给后发展国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英国劳资冲突化解机制的形成研究(1760—1914)”(13BSS029)和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英国工业化时期集体谈判制度的形成研究”(12YJA77002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梁远(1980—),女,吉林省吉林市人,山东大学威海校区翻译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刘金源(1972—),男,安徽望江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汪谦千

(上接第 140 页)身的新型知识分子,在指导思想上受到了斯大林的影响。在具体的措施方面,更是基本上照搬苏联的做法。从 1921 年—1936 年,苏联曾经在各大城市开办工人学校,这是一种工农干部升入大学的预备学校,招收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工农青年(年龄从 16 岁至 35 岁),在 3 年内修完相当于 6 年的中学课程,及毕业后直接送进大学继续学习^①。我国的工农速成中学即是模仿这种工人学校建立起来的。但苏联在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方面的理论与实践,与中国的国情并不适合,至少可以说不完全适合。例如,旧知识分子对于革命胜利后建立的人民政权的态度,在中苏两国是很不一样的。在苏联,旧知识分子对于人民政权的态度基本是抵触和不合作,革命胜利后,很多知识分子流亡国外;而在中国,旧知识分子中很大一部分人对于人民政权是拥护和支持的,革命胜利后,很多知识分子放弃在国外优越的待遇和生活工作条件回到祖国怀抱,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不考虑中苏两国旧知识分子的这种区别,教条主义地搬用斯大林的理论,把建设新中国的希望主要寄托于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这不仅对于旧知识分子不公平,而且不利于新中国的建设。再例如,苏联工人学校的学生文化基础与我国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文化基础也有很大区别。由于苏联在革命

胜利前,文化教育比我国发达,国民的文化程度也普遍高于我国,因此苏联工人学校的学生,在入学前都受过 4 年的正规教育,这样他们在入学后以 3 年时间修完相当于 6 年的中学课程,困难程度相对就要少一些;而我国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由于是以工农干部为主,很多人没有受到过正规教育,他们的文化基础是不能与苏联工人学校的学生相提并论的。在这种情况下照搬苏联的做法,要求我国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也要在 3 年时间内修完 6 年的中学课程,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教条主义地搬用苏联经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各个领域都存在的现象。指出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中所含有的教条主义色彩,应该有助于全面认识和评价这一方针。

作者简介:彭厚文(1965—),男,湖南新化人,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汪谦千

^①金凤:《苏联教育专家谈苏联工农教育》,《人民日报》1950 年 1 月 16 日,第 3 版。